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困惑及其化解

——基于个体化理论视角

李胜蓝^a, 江立华^{a,b}

(华中师范大学 a.湖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b.社会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基于四川、湖北、江西等地的田野调查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走向个体化, 父辈式“标准化”的人生轨迹不复存在, 呈现出方向迷失的职业目标困惑、工种分化的职业选择困惑、频繁跳槽的职业忠诚困惑。其职业困惑的深层原因在于“为自己而活”的价值理念盛行, 脱嵌于传统家庭引发强烈的个人诉求, 个体化进程中的安全感与稳定感缺乏。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困惑, 既需要在微观层面进行个体调适, 也需要宏观层面的社会支持。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职业困惑; 化解策略; 个体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7)05-0053-06

Professional confusion and melting strategy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 theory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ization

LI Shenglan^a, JIANG Lihua^{a,b}

(a. Hubei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 School of Soci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in some provinces like Sichuan, Hubei, Jiangxi, we found that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re moving towards individu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standardized life track of the elder generations passed out of existenc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howed a series of professional confusions such as the lost of career goals, career choice caused by occupation divis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loyalty caused by job-hopping. The deep cause of career confusion lies in the prevalence of the value concept of "living for themselves", which is caused by the strong personal demands of the traditional family, and the lack of sense of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iz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individual at the micro level and obtain the social support at the macro level.

Keywords: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professional confusion; melting strategy; individualization theory

一、问题的提出

城乡二元背景下, 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寻求职业的过程中逐渐壮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这一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已接近1亿, 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 成为农民工的主体^[1]。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群体而言, 新生代

农民工在选择职业时有着很强的能动性, 其自我的发展和对自我定义下个体利益和权利的追求成为他们关注的核心^[2-3]。学术界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职业问题的研究, 大致可分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从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角度出发, 分析该群体的就业满意度、就业观、就业能力、职业焦虑等问题。汪昕宇等认为,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普遍偏低的原因在于晋升机会和涨薪机会的不足^[4]。段慧丹认为,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焦虑主要是该群体的特殊性、企业未能尽职尽责与二元社会结构壁垒

收稿日期: 2017-09-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036)

作者简介: 李胜蓝(1993—), 女, 四川巴中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人口社会学研究。

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5]。邢美华等基于湖北6县的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倾向主要受工作机会、所属服务行业性质、行业技术水平、资金扶持的影响,而其就业能力则受文化素质、专业技能、工作耐受力、政策认知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因素的影响^[6]。

二是从外部社会环境及结构维度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就业质量、职业流动、就业稳定性等问题进行分析。范千千认为,权益保障的缺失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面临的突出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动保护措施不完善,参加社保的比例也很低^[7]。杨冬民等认为,在就业过程中他们面临着就业层次较低、稳定性较差、就业途径较窄、收入水平较低等困境,自身发展状况、制度环境、社会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是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8]。包丽颖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最主要的职业困境有社会性排斥、社会保障和培训体系不够健全,要加快推进户籍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创新就业服务和培训模式,以减轻他们的职业压力^[9]。陈昭玖等认为,由于用工环境的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稳定性上与其父辈相比明显下降^[10]。

可以看出,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问题的相关研究中,当前学界大多基于数据分析做出直观展示,仅对现象进行梳理和说明,缺乏相关理论的指导。笔者认为,在探寻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困惑及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及机制时,务必在社会转型这一大背景下展开。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职业环境及社会环境已发生较大转变,在职业问题上,区别于老一代农民工职业上的“趋同”,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更多个体差异,“个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凸显。由于传统“参照标准”失去效力,脱嵌于传统的他们不得不在风险社会中单打独斗,在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未知”中去寻找答案。个体化理论能够解释中国社会转型和深刻变革中的“个人之崛起”。为此,笔者拟从个体化理论视角出发,聚焦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微观职业生活,发掘该群体当前面临哪些职业困惑,并对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及应对措施进行探讨。

本研究采取对新生代农民工个案进行深度访谈的调研方法,在问卷和访谈提纲的基础上,选取

四川、湖北、江西、山东、河南、湖南、河北等农民工输出大省展开田野调研,对80个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个案进行了访谈。调查内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当前工作状况、辞工动因及其过程、认知与目标、个体化和代际分化、生活消费娱乐等方面。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职业困惑

调查显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自己的人生选择上想要把握主动性,为自己负责,所谓父辈式“标准化”的人生轨迹不复存在。他们在获得权利的同时也伴随着代价和牺牲,因而存在一系列的职业困惑:缺乏清晰的方向和目标;在职业工种选择上犹豫不决;短工化现象明显,存在职业忠诚度方面的困惑。这些职业困惑给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自身带来极大困扰的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具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困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方向迷失的职业目标困惑

目标不清晰、对未来发展道路缺乏清晰的规划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困惑之一。当问及“外出打工有没有如挣钱、定居城市、学技术等明确的目标?”“你理想中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什么职业?多少收入?想达到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等问题时,他们的回答是:

“没有想过……经济状况至少是能够养家糊口,让父母生活条件过得好一点,自己生活轻松一点,做了那么久也没有找到特别喜欢的。”(20160125HB-LH)

“目前还没想过,等赚了一点钱再考虑到底做哪方面比较适合一点。”(20160212JS-JKWJ)

“我理想的工作肯定是自己开个店子,自己当个小老板。”“打算做什么生意?那不晓得。边走边看吧。”(20160128HB-LC)

严格意义上来讲,传统老一代农民工务工大抵遵循着“打工—积累技术及资本—创业”的标准化发展模式。他们跟随同乡或亲戚的步伐来到城市,不用对工种及行业有过多的考量。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努力工作,如何积攒更多技术、金钱和人脉资本是他们思索较多的问题。较之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个体意识的觉醒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觉醒也是不充分的,他们只知极力摆脱父辈的职

业“命定”模式，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数来，但囿于各种限制，对自身并没有明确定位，缺乏清晰的职业目标和规划，对未来充满迷茫和困惑。

2. 工种分化的职业选择困惑

相较于老一辈子承父业或亲戚、朋友式的“熟人”交换信息的方式，新生代农民工获得职业信息的方式和渠道变得多样。

“平常会登录一些发布职业招聘信息的网站呀，然后把自己的简历发过去，如果对方给了面试邀请，就过去面试。”(20160203SC-XQY)

手机和电脑的普遍使用加速了信息的流动和交换，通过互联网求职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求职的一个重要渠道。求职的方式变得多样，职业选择的种类也明显增多，摆脱了老一辈的单一性。但职业选择空间的拓展，也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了更多的烦恼：

“我现在就是不晓得自己要干啥，之前到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但是一天起早贪黑的，一个月还只有两三千的工资……想出来(从火锅店辞职)，可是你说我又能去做个啥，有时候也想自己去做个小生意啥的，可是万一赔了呢？本来家里就莫得(没有)啥子钱。我现在就想入个啥子行，然后一直干下去，可是关键在于入哪行嘛……”(20160212SC-LWH)

笔者在访谈中发现，老一代务工者基本为夫妻结伴而行，绝大多数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作，这种“标配式”的打工模式在老一代农民工群体内成为不假思索的命定模式。而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还有部分依旧在建筑行业或工厂，但从事类似的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个案几乎为零。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愿意吃老一辈的苦，普遍活跃在快递、美容美发美甲、销售、个体户、汽车维修以及需要更多脑力劳动和技术含量的平面设计等相关行业。获取招聘信息渠道的增多、职业的种类变得多样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就业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但他们在面临行业选择时却不知如何下手、犹疑不决，充满着各种不确定。“他们并不知道要什么，能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11]

3. 频繁跳槽的职业忠诚困惑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困惑还表现为短工化严重，频繁换工和跳槽现象十分普遍。一项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有 57.1% 的新生代农民工两年内

至少更换过一次工作，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 20% 在城市稳定就业，近 80% 处于不稳定状态^[12]。笔者调研也发现，外出务工超过三年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有过换工的经历。

“我感觉到我融入了那里的时候我就走掉了……各方面很熟悉的时候我就走掉了。”(20160212JX-HXN)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觉得手上的工作做久了觉得烦了，正好我哥们儿介绍说有个好工作，我就去了，反正不做就不做了呗，也没多大事儿，人家也不会管你。”(20160206SC-HFC)

辞职、甚至是不经领导同意直接离职的现象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显得十分普遍。虽然部分受访者在辞工之前已找到“下家”，但更多受访者却是任性辞职，对于下一份工作没有任何计划。老一代农民工并不赞同频繁更换工作的做法，在他们看来，稳定和勤勤恳恳做传统行业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面对来自家庭成员的“不同声音”，新生代农民工依旧遵循自己的意愿和偏好，对这些意见或置之不理或隐瞒自己的工作状态。

“(我做)这行的话我爸不愿意。目前我都不给他听，因为他怕我们老是换来换去有什么不好，不正规之类的……一般都是跟父母说还在原来的厂里面。”(20160215JS-JKWJ)

“我都是换(工作)了再说。还是害怕家里人说，他不同意，显得(我)不听话。”(20160213HB-ZK)

这些任性的辞工和换工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身、企业及社会都带来负面影响。第一，职业的任意变动，频繁地更换工作，造成了他们工作和生活的极不稳定，无法促成其劳动技术的养成，职业技能的系统性受到干扰，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缺乏连续性，因而难以形成稳定的向上流动的预期。其次，寻求下一份工作，需要付出一定的金钱和时间成本，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当问到“换工期间的经济来源”时，他们的回答是“用之前工作的积蓄”、“跟父母一起吃住”。第三，走出农村家乡的他们势必要争取融入城市，但频繁更换工作使他们无法建立熟悉的社会圈子，没有较深的人际关系，缺乏归属感，脱嵌于乡村社会的同时也无法真正意义上地再嵌入城市社会。同时，对于企业来说，频繁的人员异动会诱发“用工荒”，导致用工成本的

增加,客观上也使整个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

三、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困惑的深层诱因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明显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困惑。那么,造就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困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走向个体化的他们个性得以彰显,意欲自主选择 and 决定,而自身准备和能力的不足以及脱离传统、裸露于风险之中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困惑的深层诱因。

1. “为自己而活”的价值理念盛行

社会转型带来的个体化使得“个体成为自身生活的原作者,成为个体认同的创造者”^[3]。与传统脱离得更加彻底的新生代群体,现代性的痕迹充斥于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化的典型特征在他们身上得以体现。他们可以选择“随自己意愿而过的人生”,更加注重舒适的个人体验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为自己而活”的诉求强烈:

“(选择工作)主要从自由、挣钱多、工作轻松这些方面考虑。但是父辈们普遍都是脚踏实地,能够挣钱养家糊口就行。”(20160125HB-LH)

“觉得不自由,上班还要打卡,上班不自由,上厕所还要定时,必须要那个点才能去上,还不准玩手机什么的。”(20160213SD-WYL)

“他们的追求就是工资高,自己的追求就是自由。”(20160212JX-PJ)

老一代农民工经常会将高工资视为好工作的唯一标准,并愿意为此付出体力及牺牲掉其他个体需要。与老一代农民工群体明显不同的是,追求新鲜刺激、更短和更自由的工作时间是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时的重要考量标准。一旦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考虑再换一份工作。此外,追求职业上的个人发展和自我实现也成为他们辞掉当前工作的原因,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在访谈中谈到自己不满意当前岗位的原因在于该岗位不能提供可供自己学习的技能和机会,因而辞工成为必要。

“学到了技术、慢慢可以胜任这份工作,你肯定会追求更高的发展嘛。”(20160212JX-PB)

事实上,频繁的“选择—更换—下一个选择”循环的背后映射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定位的不明晰和不准确,他们以为在这个开放的、充满选

择与机遇的新时代,想要找一份他们认可的“满意”的工作并非难事。他们打着“为自己而活”、“追寻自由”的旗号,实质上却是对现实的逃避,对自己能力的误判和对正确劳动观念的视而不见。虽然在表面上成为自身命运和生涯决定者的他们,实质上却迷失在充满选择与诱惑的个体化社会之中,导致对未来发展丧失规划、茫然不知所措,不加考虑地频繁跳槽。

2. 脱嵌于传统家庭引发强烈的个人诉求

老一代农民工始终与家庭紧密相连,他们牺牲掉自己的需要追求职业带来的物质利益上的最大化,主要是为了让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有物质保障。而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依旧作为家庭中的一员,却已从传统和原有制度中抽离出来,脱嵌于传统家庭的他们已不再仅仅依附于传统的家庭之轴,一味遵从家庭成员的想法,而是能够能动地以市场为中介选择生存手段,以自己的需要为基础选择职业生涯,父辈式的“标准化的人生”被“选择性人生”或“自主性人生”^[3]所替代。

在访谈中问及“父母是否会影响到决定”、“换工作更看重家庭还是自己的需要”时,他们大都表示虽然还是会考虑家庭成员的看法,但更多地却是关注自身的需求。

“或多或少也会听?但是在最终的决定中占的份额没多少。主要以自身的事业为重……更多是以自己为主。”(20160125HB-LH)

“感觉自己蛮独立的,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决定。怎么说呢?爸妈年纪大了,有些事情他们不太理解。”(20160206HB-WXM)

由于社会发展带来物质条件的改善,农村家庭对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职业获得物质利益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紧迫性大大降低,他们的工作是为了能够实现自立和追求更好的发展。在问到“是否给家人寄钱”、“承担多大的家庭责任”时:

“他们不会期待你要挣多少钱,只要你开心一点、工作环境还好、未来发展好一点,这样就可以了。”(20160212HB-PB)

从原有地域、宗族、社会关系中脱嵌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行为逻辑、价值诉求等方面更多地呈现出满足自我需要的个体化特征,个体诉求摆在了突出的位置。然而要脱离传统的既定安排,实现自立甚

至追求更好的发展,必须建立在自身有实力妥帖安排好职业和人生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仅依靠自己的能力实现这一切却显得较有难度。是继续坚守,还是选择退守,子承父业,走父辈的老路?他们陷入职业困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3. 个体化进程中的安全感与稳定感缺乏

一般而言,在个体化进程中,脱嵌于传统家庭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更加紧密。然而,新生代农民工不但无法依赖于社会,反而在个体化引发的系统风险中面临无枝可依的境地,他们企图通过职业手段追求自我实现之路显得十分艰难,生活的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感在逐步加深。

其一,因参考标准的缺失和“知识的不确定”导致未来的不确定。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化前所未有的,父辈和传统已变得不具有参考价值,所谓的新的知识和科学又充满着变动和不确定性。新生代农民工同时失去传统和现代制度的庇护,在价值观变得多元而难以区分正误的个体化社会的今天,“无法预期的后果”加深了其职业选择及发展上的困惑,在难以对未来有较清晰规划的前提下,伴随着极大的不确定,便匆匆奔赴下一个不可知的未来。

其二,在城市社会中获得认同的失败。离开乡村来到陌生的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融入其中,于是在衣食住行的各方面花心思使得自己能像个“城市人”。正如余晓敏研究认为,身处被城市排斥的新生代打工群体,试图以对城市市民消费习惯的模仿来减少自己所受的歧视和排挤,追求新的身份认同^[13]。然而,职业作为个人不断取得收入而连续从事的一种具有市场价值的特殊活动,决定了从事它的个体的社会地位^[14]。要从根本上融入城市,首先必须在城市中谋得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以获得安身立命的资本。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世界中追求身份认同,希望获得城市社会的认可,不可避免又回归到职业问题上来。而新生代农民工从事职业的不入流,宣示了其城市认同的失败命运。

其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个体化进程,中国的个体化进程并没有伴随着十分完备的福利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个体在社会中会遭遇很大的风险。一方面是劳动合同、工伤保险等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另一方面是即使有了制度作保障,法律意识淡

薄的他们大多不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由用人单位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导致的随意扣薪、拖欠农民工工资、任意裁员等而引发的农民工抗争行为并非个别现象。游离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更多时候被排除在制度的庇护之外,裸露在风险之中,成为不被保护的群体。

这种看似“自由”选择的背后,更多的是对自身和社会风险认知不清的前提下做出的“被动自由选择”的无奈之举。这种无制度依存的困境与个体生活的境遇,导致了其在个体化变局下面临着重重“风险”^[15]。与其职业问题相对应,从事何种行业、怎样得到晋升、达到何种目标?他们面对这些问题时或徘徊犹疑、或被迫匆匆做出选择,在个体的焦虑和不安中,在社会的催促下,频繁跳槽或许是他们试图挣脱烦恼,期待迎来新景象的一种解压方式,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消极的方式进一步加深了其生活的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感。

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困惑的化解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的一系列职业困惑与他们身处的个体化社会有直接关系。由传统社会转型到个体化社会,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新的价值观念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接受了现代性的渲染,与传统家庭脱嵌,主动或被动地实现个体化的华丽转身。探讨与个体化不无关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困惑和出路,须紧紧扣住个体化时代背景,从微观的个体化了的个体以及宏观的社会两个层面来展开讨论。

1. 微观层面的个体调适

“为自己而活”是个体化的明显标志之一,“选择的人生”,意味着个体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失败也是自己的。新生代农民工追求工作上的高薪资、更多自由和时间,但是在有意无意中忽视了自身能力是否与这样的职业相匹配的事实。“为自己而活”更多地体现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不计后果的任性辞职,短工化成为其不敢直面内心恐惧而逃避现实的一种压力释放手段和方式,体现为对传统的抛弃、对规则的蔑视以及对责任和义务的逃避。因而,要应对职业困惑,他们自身必须要做出努力。一是要学习各种专业技能,提升自身的

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为追求理想职业做好准备。技术含量越高的职业其能够为社会提供的价值更高,同时可替代性也越低。只有不断学习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才能在就业环境日趋严峻的今天使自己能够获得一个较为安全的位置,收获一份长期稳定的职业,降低不安全感。

二是要端正职业态度,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手段,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通过劳动为社会做出贡献是个体应尽的义务。频繁的选择和跳槽考验着个体在职业上的忠诚度,也客观上加速了社会的流动,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不稳定。个体在追求自由的同时必须要肩负责任,尽职尽责,干一行爱一行,不断在职业中挖掘自身潜力,而不是频繁更换工作尽一个职业人应有的本分。

2. 宏观层面的社会支持

在个体化进程中,个体力量虽然逐渐得以凸显,然而与社会相比,个体的渺小毋庸置疑。个体表面上虽然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却依旧囿于强大的集体和社会的力量而不能掌控生活的全部。因而,在宏观层面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正确择业、稳定就业和获得长足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和制度支持同样必要。

其一,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乡村脱嵌,要想办法让他们嵌入其工作生活的城市环境中,引导城市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建立起正确的认知,减少对该群体的排斥,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

其二,呼吁企业肩负起应尽的社会责任,树立服务意识,在用人、裁员等方面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减少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歧视,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能在一个相对安全和公平的社会环境中就业。

最后,要有针对性地建立起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当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层次还较低,因此在政府层面,强制实行工伤保险制度,完善劳动合同法,监督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合法权益,以减轻企业裁员的任意性。同时,开展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上的培训和职业规划上的引导,使他们的专业技能能适

应用工单位的需要,增加他们的求职成功率;增强他们对个人和社会的认知能力,使其逐渐形成对于自身发展的远景设计和规划,减轻其在职业目标和选择上的困惑,减少短工化行为,促成其稳定就业,维护其长远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 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 [EB/OL]. (2011-03-13)[2017-03-15]. http://www.stats.gov.cn/ztc/ztfx/fxbg/201103/t20110310_16148.html.
- [2] 阎云翔.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 陆洋,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6-8.
- [3] 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 个体化[M]. 李荣山,范疆,张惠强,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23.
- [4] 汪昕宇,陈雄鹰,邹建纲. 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评价及其比较分析——以北京市为例[J]. 人口与经济,2016(5):84.
- [5] 段慧丹.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焦虑问题研究[J]. 青年探索,2013(4):74.
- [6] 邢美华,胡定金,黄其振.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意愿分析及对策思考——基于湖北省的实证调查[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7.
- [7] 范千千. 系统论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与解困[D]. 重庆:重庆大学,2013:19-20.
- [8] 杨冬民,陈金利.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及对策研究[J].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5(4):19.
- [9] 包丽颖,陈柳钦.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再探讨[J]. 中国青年研究,2011(4):75.
- [10] 陈昭玖,艾勇波,邓莹,等.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6.
- [11] 黄闯. 个性与理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短工化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2012(11):82.
- [12] 韩长赋.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调查与思考[N]. 光明日报,2012-03-16(07).
- [13] 余晓敏. 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创造[J]. 社会学研究,2008(3):164-166.
- [14] 姚裕群. 关于职业社会学的几个问题[J]. 科学·经济·社会,1990(2):96.
- [15] 张红霞,江立华. 个体化变局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脱域”与“风险”[J]. 中国青年研究,2016(1):49.

责任编辑:曾凡盛